

## 美国对华文化外交(1970-1979):一种理论分析

胡 腾 蛟

(长沙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20世纪70年代,中美文化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乒乓外交”。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应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即中美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地输出。

**[关键词]** 文化; 文化外交; 中美关系(1970-1979)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56-03

“文化”的代表性概念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蕴含在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即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因袭的概念系统。藉此,人们交流,持续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sup>[1]</sup>文化本质上是流动的,各文化实体之间必定发生联系,无论文化与文明,都可视之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因此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sup>[2]</sup>文化交往的意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得国家的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国家在互动中建构共有的国际文化,从而实现理想的国家间关系。另一方面,文化往往被异化为一种权力资源,某些国家信奉文化的权力本质,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文化目标,对对象国(subject nation)实施文化侵略。

对外关系中的文化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冯绍雷认为,文化中的主流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这三种因素相互结合,共同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政治哲学,是国家实施文化外交的哲学基础;意识形态,是文化外交的思想武器;政治文化,成为文化外交的舆情支撑。英国学者米彻尔给出的文化外交概念较具代表性,他认为文化外交具有如下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即指政府间做出的以允许、方便或规范文化交流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第二重含义较之第一重则较不确定,本质上而言,这些协议的执行以及源于这些协议的文化关系行为可视之为扩大(extended)的政府责任,也可认为是政府授予文化机构或组织的某些权限,前者就是第二层次上的文化外交。<sup>[3]</sup>他的概念稍嫌简约,指出了政府在文化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没有指出文化外交的特定内涵。结合上述的文化概念分析,文化外交的适当定义应是,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有意识地以本国的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为主要文化内容,运用种种文化手段与措施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文化外交典型的发展时期,但人们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乒乓外交”。实质上,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的输出。这三大维度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

### 一 文化方式引导下的战略对话

政治哲学,即关于外交理论与思想的概念化与逻辑体系,是文化外交的一大基本内容。文化外交能够巧妙地把自已的战略意图和所持的基本政治态度传递给对象国,期望双方进行战略互动。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与其它国家不同,文化外交在其中的作用相当突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苏中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的冲突已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主要角力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了无法预见的可能性。<sup>[4]</sup>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国际地位已和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紧紧地缠结在一起。此时苏联的权力正日益“接近它的顶峰”、“不可终结的印度支那战争已撕裂美国内遏制共产主义的共识”、“在血腥、不受欢迎的(越南)战争中主掌美国对外关系的”<sup>[5]</sup>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进行政治哲学和战略思维转向。“基辛格的权力政治观点、大量的现实因素综合起来促使尼克松和随后的卡特总统注重妥协,……在美国政治哲学中继续延续着非暴力传统。因此,他们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背离了此前美国的实践。”<sup>[6]</sup>尼克松权力政治的形成和“均势”外交的提出,在政治哲学表述中实质上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帮助政策决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

**[收稿日期]** 2008-10-08

**[基金项目]** 长沙学院科研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研究(1970-1979年)》阶段性成果(编号:60800-90640)

**[作者简介]** 胡腾蛟(1978-),男,湖南邵东人,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讲师。

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sup>[7]</sup>在他们看来,共同抵制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地缘战略需求使它们能够走到一起,因此中国领导者也就会被他们定性为“均势家”和“相对性艺术家(artists of relativity)”。从中国地缘政治观念看,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使得中国也越来越依赖美国以从外交和战略上抵消苏联的威胁,因此两国由对抗走向缓和的战略环境已逐渐形成。

尼克松通过各种文化途径与非政治方式对中国作出种种试探后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对华缓和战略。1969年7月,美国利用法国、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积极进行外交斡旋,以确保这些信号按预期的精神被中国理解。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抓住南斯拉夫时装会这一文化活动所提供的良机转告中方说尼克松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中国显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到了1970年国庆,毛泽东通过文化人士斯诺从战略上回应了美国,表明中美解冻的可能性。此后他同斯诺交谈时又表示,他欣赏尼克松总统的现实主义眼光,自己在对美战略对话中也是出于现实主义考量,这一谈话精神“当时异乎寻常地在中国层层传达,一直到农村大队党支部”<sup>[8]</sup>。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访华后,乒乓外交加速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巧妙引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以诗词为隐喻彰显这次会晤的重大政治内涵,充分反映尼克松寻求中美和解的急切心情。27日,周总理答应送给国务院一部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此前他已承诺送给美国一对大熊猫,美国上下高兴不已。

此后,两国文化活动继续围绕着中美战略互动展开,双方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善,美国鼓励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为双边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1978年7月,以卡特技术顾问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为首的代表团应邀访华,中国向他们表示,两国之间的文化与科技交流的扩大之所以悬而未决,在于两国关系并没有实现正常化,这与美国科学代表团的即时目标不吻合,即通过科学交流以满足中国获取外国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方式,加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9年布热津斯基访华,在参观长城时与中国官员比赛,借机开玩笑说,最后到的人就罚他对抗俄国人,表达了美国与中国分享战略利益的意愿。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对扩大对华文化交流具有澎湃的热情,因此常利用这种热情向美国政府施压,旨在通过此类交流促使有条件地改变美台关系从而改善对华政治关系。在一次中美对话中问及是否继续进行教育交流时,中国暗示,在美国大学里的台湾学生和教授的现状可能把中国学生置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化交流也常包含着对台外交胜利这样更为显著的企图,一家赴美艺术团在表演中就被鼓励演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歌曲。<sup>[9]</sup>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批评也成为“众多美国人的禁忌”,一位中国观察家抱怨说“文化签证”“麻痹了美国人的批判能力(critical faculties)”,反衬出中美双边交往的乐观局面。即使周恩来,在某个场合

也表示美国访华记者对中国进行了不现实的、乐观的描述,他对这一趋势能否持久表示担心。<sup>[10]</sup>

## 二 公众与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互动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投射到国际关系话语中即指影响一国政府行为和政治的主流价值观、态度和信念,<sup>[11]</sup>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其政治文化取向,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则是看公众对决策的舆论反应及决策前的心理取向。因此,使得大众文化因素合理地介入决策过程的正当机制就成为文化外交的必然诉求。

这一历史时段美国政治精英无疑成为公众与美国政府间政治文化互动的先锋。早在1966年,鲍大可就认为美国应奉行“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接纳共产党中国和“台湾共和国”同时进入联合国,<sup>[12]</sup>由此引发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应。年底,美国务院即专门成立由鲍大可、费正清等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研究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3月,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大型讨论会,包括学者、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在内的2500余人与会,达成了美国不能忽视“共产党中国”存在的共识。次年9月15日到10月6日,16名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参加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中美未来战略听证会”,就当时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次范围最为广泛的辩论,他们认为,美国不是是否应改变对华政策,而是如何采取具体行动了。<sup>[13]</sup>1971年2月4—5日,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关系会议就中美两国现存关系的根源、台湾问题和对华新姿态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于次年公开发表,扩大了舆论影响。1971年7月21日,谢伟斯、戴维斯等“中国通”出席参院外委会会议时尖锐地指出,美国未能及时地实行与中共合作或中立的政策,而全力支持蒋介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sup>[14]</sup>

在他们强有力的影响下,美国公众普遍要求改善对华关系,从而在客观上为新任总统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撑。1966至1969年间,美国公众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席位的意见持续高涨,<sup>[15]</sup>1969年1月,盖洛普就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分年龄组进行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政府后期人们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在强大的民意支撑下,美国政府着手放宽去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物资,此后完全取消对华旅行限制,这些“细小却重大”的变化反过来吸引了公众更大的兴趣,从而在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互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盖洛普和哈里斯的调查显示美国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各种报刊呼吁全面改善对华关系,赞成给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sup>[16]</sup>一些编辑和记者甚至不失时机地开始提出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两个中国的理论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活生生地一劈两半”,“是一项一个中国都没有的政策。”<sup>[17]</sup>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他将于次年2月访问中国的消息再次把美国舆论推向历史高峰,盖洛普关

于这一消息的调查显示高达98%的人听说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公众对华的积极政治取向反过来又使尼克松政府备受鼓舞,尼克松更加坚定了北京之行的决心。尼克松访华之后,他的对华政策也收到了良好的舆论反馈,1972年4月,在明尼苏达州的民意测验中,该州居民中的31%承认,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好感”也由1972年的23%升至1973年的49%。<sup>[18]</sup>

可见在外交问题上,上层舆论的转变在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转变的同时,政治精英的政策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公众的政治文化取向强有力的支撑,两者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因此得到很好的彰显。

### 三 美国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

从利益与文化关系上看,意识形态是阶级或集团利益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是指导该阶级或集团行动的思想纲要,意识形态输出作为文化外交的一大维度,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意味,“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偏见,一种为了影响进而为了统治目的的方式。”<sup>[19]</sup>

尼克松式的缓和战略,将意识形态斗争与国家利益概念的结合进行理性化设计,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力图将异质文化体系内的中国纳入西方文化体系中,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用“文化方法”解决,强调软权力的进攻在于修正中国制度。即如当时美国驻华文化参赞沃尔顿·巴特沃思所说,“我们必须鼓励与支持同美国民主意识形态最接近的中国群体”,教育机会使之倾向于他们偏好他们所学习的国家,并期望中国深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制度的修正力量(modifying force on the Chinese system)”。可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确是冷战的反映和美国扩张政策的隐喻。<sup>[20]</sup>

援助关系的文化维度主要在于人的维度,因此中国知识精英成为美国意识形态进攻最方便的目标群。在双边教育交流方面,美国着手完成:(1)重启和扩大“富布勒特方案”。中国虽然表明了对富布勒特方案扩大到商业、管理和科学方面的偏好,但拒绝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和社科交流,而美国坚持两国之间进行此类交流,在互相妥协后艰难地达成了协议。<sup>[21]</sup>(2)1978年成立美中教育和训练特遣队(Task-Forces),建议美国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官方监督,为本国政治利益最大化服务。因此中情局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强化了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sup>[22]</sup>(3)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参与双边教育交流。其自封(self-imposed)的义务是为“寻求真理和学习专业技能的中国学者与学生服务”。1979年它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确认了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考虑到中国对它的意识形态输出很反感,董事会和中国教委达成了一项协议,强调自己并无意在中国建立教育制度和进行宗教教化活动,在对华援助的领域里“谨慎地遵循了它的政策决策而不是‘入侵’”<sup>[23]</sup>。福特基金会于1979年之前提供了4千余万美元资助美国和其海外机构进行一项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工程。1979年至1982年两年内,它又特别提供两百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机构和美国机构之间的学术与教授交

流。<sup>[24]</sup>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考虑到早年在美国接受训练和教育、了解美国的中国自治组织领导者正迅速从政治舞台中退出,难以继续向中国领导者解释美国,而新一代领导者并不具备“相似的经验以及与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它发起的一个经常性项目就是邀请诸如省部级官员、新闻记者、社科院、青年妇女政治领导者等人员组成的代表团访美。并于1980年规划了为期两周的学术项目,以图发展“美中两国高层领导者间的相互理解”。<sup>[25]</sup>

全国民主捐赠基金宣称,思想传播在当代世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应帮助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成为稳定和富有活力的民主社会。该基金会考虑到在西方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同样把留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目标群,为此它向《中国知识分子》杂志提供资助,旨在“培养文化和知识多元主义者”。该组织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打开像中国这样“更为稳固的封闭性社会”的方式的建议,具体项目包括使之对西方作家、艺术家和“笔友工程”的认可,以便美国孩子能够与中国孩子交流。<sup>[26]</sup>

美国之音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之下,其报道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国内事务,追求所谓的客观性。按照美国之音官员的看法,美国文学最能体现“美国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个人主义”。中国官员,包括几乎所有处理美国事务的外交官和副总理,都是美国之音的普通听众。由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的“快速”与“客观性”,已成为中国受众第二大重要信息源。<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 [6] Richard J. Payne. The Clash with Distant Cultures—Values, Interests, and For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7. 86.
- [2] 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
- [3] [19] J. M. Mitchel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M].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86. 2-5. 18.
- [4]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75 [M].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77. 143.
- [5] Friedman, Michael Jay. Nixon as Scapegoat, Event on China [J]. Orbis. Fall 2000, Vol. 44 Issue 4.
- [7] Joseph Fankel.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3.
- [8] 杨玉圣. 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259.
- [9] [21][22][23][24][25][26][27] Taifa Yu.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the Sino—U. S. Cultural Relationship: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M]. 北京图书馆: 1988. 43. 93-97. 57-61. 108-114. 105-107. 76-84. 84-39. 89-93.

(下转第77页)

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学生资助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公益事业,其间的许多方面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制约。加紧这方面的立法不仅能为国家助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和保障,而且也是国家意志在助学事业中的体现,是政策法律化、定型化的必然趋势。学生资助法也为设立有关学生资助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依法设置的机构便于行使对学生资助的管理权;而完备的法律也便于对各种组织或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包括贷款制度在内的多种资助形式需要科学而又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借贷关系更需要有法可依,更需要法律来保护。学生资助法还能够保护捐助助学的社会组织 and 个人的合法权利,从法律高度给他们以优惠和激励。总之,立法

是政策合法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化的学生资助事业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最终选择。

#### [参考文献]

- [1] 黄 娟,董兴亮. 新生带张表 无忧进大学[N]. 人民日报,2007-07-03.
- [2] 邢宝君. 构建大学和谐校园的几点思考[N]. 光明日报,2005-10-25.
- [3] 张民选. 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48.
- [4] 沈东华. 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运行机制存在不足研究[J]. 成才之路,2007,(36):38.

## On the System of Student Aids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Harmonious Campus

LI Zhao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resently the system of student aids polic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country, which is th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harmonious campus. In the current system there are some unfair factors and the policies are instable and of low-efficiency. We should renew the ideas of aids, perfect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draw up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ystem of student aids policies; harmonious campus

(上接第58页)

- [10] Lucian W. Pye.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on The Sands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China and America: 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 ed. William J. Barnd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1]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00.
- [12] 李增田. 鲍大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J]. 美国研究, 2004,(2).
- [13] [14][17] 潘广辉. 尼克松政府成功调整对华政策的缘由——一项侧重国内背景的研究[J].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
- [15] [16][18] 何 慧. 浅析公众舆论于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影响[J]. 世界历史,1999,(5).
- [20] Frank A.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M]. Chicag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reface.

## America Cultural Diplomacy in China(1970 - 1979) : An Analysis of Theory Frame

HU Teng - jiao

(Changsha college,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America cultural diplomacy in China from 1970 to 1979 contains three meanings beyond the "Ping - Pong Diplomacy": the strategic dialogues directed by culture op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elites in USA; USA wielded the weapon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 philosophy to influence PRC.

**Key words:** Culture; Cultural Diplomacy; Sino - U. S. Relations(1970 - 1979)